

【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中国古文字学

基础

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
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
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
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
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
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
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
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
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
被古文字学证实了，
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

——(美)张光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复旦文博系列教材 *

* 复旦文博系列教材 *

【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朱顺龙、何立民编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80681-596-1

I.中... II.①朱...②何... III.汉字:古文字—本科—研究生—教材 IV.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9828 号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编 著 朱顺龙、何立民

责任编辑 任海平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政编码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200

ISBN 7-80681-596-1/K·142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1
第一节 中国古文字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学习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及其意义	2
第二章 汉字的发展沿革	6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	6
第二节 汉字的萌芽、起源时期	8
第三节 汉字的逐步成熟时期	11
第三章 汉代小学的兴起和隋唐文字学研究的发展	17
第一节 小学的萌芽与兴起	17
第二节 汉代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18
第三节 汉代童蒙正字字书的编定	20
第四节 汉语训诂学和方言研究的发端	22
第五节 《说文解字》与汉代小学研究	26
第六节 六朝隋唐的文字学成就	29
第四章 两宋金石学的鼎盛和元明文字学研究的低迷	37
第一节 “二徐”的《说文》研究	37
第二节 宋元明时代对“六书”的探讨	39
第三节 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繁荣	40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字书、韵书编纂	45
第五章 清代考据学的崛起和金石学小学的复兴	50
第一节 “乾嘉学派”的相关贡献	51
第二节 “《说文》四大家”的成果	54
第三节 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繁荣	59
第四节 清代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	63

第五节 晚清甲骨学的奠基及“罗王之学”	64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72
第一节 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创立及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贡献	72
第二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进展	77
第三节 建国后古文字学以及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一	88
第四节 建国后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二	92
第五节 西周甲骨学	99
第六节 建国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新进展	102
第七节 战国文字的研究	107
第八节 国际显学——简帛学研究的巨大进展	109
第七章 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	127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的相关研究	127
第二节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131
第三节 20世纪下半叶海外学者的竹简帛书研究	136
第四节 台湾、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142
第八章 甲骨学——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一	151
第一节 殷商甲骨文	151
第二节 殷商甲骨文的基本内容	157
第三节 甲骨文单字释读	162
第四节 殷商甲骨片释读	177
第五节 西周甲骨 附：甲骨大事简表	200
第六节 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206
第九章 商与西周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二	217
第一节 青铜器简介	218
第二节 金文的研究	220
第三节 金文的年代	222
第四节 金文的内容	224
第五节 商、西周金文句读释读	227
第六节 殷商西周金文的书法艺术	244
第十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三	251
第一节 概述	251

第二节	金文选读	252
第三节	战国货币文字选读	284
第四节	战国玺印文字选读	294
第五节	战国兵器刻辞选读	299
第六节	春秋战国金文的书法艺术	305
第十一章	春秋战国石刻铭辞——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四	311
第一节	石刻铭辞研读	311
第二节	诅楚文研读	317
第三节	战国秦高奴禾石权研读	318
第十二章	春秋盟书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五	320
第一节	侯马盟书	320
第二节	温县盟书	323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简帛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六	326
第一节	简牍帛书概述	326
第二节	简牍帛书的形制	327
第三节	发现竹简举例	330
第四节	战国竹简文字选读	335
第五节	帛书选读	350
第六节	春秋战国文字的书法艺术	352
附录		
表 1:	春秋战国出土简牍帛书一览表	361
表 2:	汉晋简帛出土情况一览表	363
表 3:	甲骨文著录书目全、简称对照一览表	365
表 4:	青铜器著作举要	371
	常用甲金篆隶文字备查	374
后记	朱顺龙	399

第一章 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中国古文字学是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关于学习古文字的方法,王国维、陈梦家、于省吾、唐兰和杨树达等人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些便于初学者学习的方法。学好古文字学,对于研究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文字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中国古文字学是以考察汉字产生、发展与演变,研究并解读出土古文字资料,并藉此对中国上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探索的一门学科,分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材料(如甲骨卜辞、金文等)为对象,着重于文字的释读,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的概念可上溯至汉代。东汉许慎曾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①班固也说“张敞好古文字”。^②

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有成熟体系的古文字是甲骨文字,它出现在殷商后期,是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有少量纪事刻辞。因其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旧址,又称“殷墟文字”。甲骨文中除了有许多象形字(很接近于一种线条化的图形,采取实物的某个特征,突出其形象,

只追求字像实物以表意,而不拘泥于笔划的增减和字形的正反向背)以外,还有其他多种汉字的造字方法,体现了汉字由发展进而成熟的过程及其面貌,因此,甲骨文是我们研究古文字的第一类内容。

随后出现的金文是铸或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旧称“钟鼎文”。它与甲骨文相当接近,属于同一结构体系。不过,由于铸刻的原因,比起甲骨文来,金文字迹较大,笔划较粗,圆笔较多,也有少数方笔的,总体上比较匀称简单。这是古文字学范畴中的第二类内容。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各地出现了“语言异声、文字异体”的局面。诸侯列国应用的文字呈现了明显的地方特色,书写材料也渐次丰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文字体系,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三类内容。

第四类内容是近些年来兴起并成为又一门国际显学的“简帛”学,它以出土的竹简、帛书为研究对象,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进而对其反映的思想文化等内容展开深入的探讨,解决了许多重要课题。

因此,按照目前较为通行的说法,古文字学大致包括上述四个文字分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简帛文字。汉代学者习惯上把隶书称为今文,而把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古文。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可以认为古文字就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第二节 学习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及其意义

古文字因年代久远,字形复杂,读音变异,使今人在学习它们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学习古文字,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在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考释文字的方法,如偏旁分析法、历史比较法、辞义推勘法、辞例比较法,等等,对古文字考释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这些方法过于专业,不太适合初学者或一般爱好者。相对而言,以下一些步骤可能对初涉此道者较为适合:

一、熟悉相关历史文献,开阔视野,加强文化修养。

二、结合汉语言发展史的线索,参考民俗学的相关资料,理解古文字的时代

背景。

三、以小篆为基础，熟悉早期汉字的形体，然后再上溯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字，循序渐进，逐步掌握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于今人来说，熟悉中国的古文字，相当于掌握了一种语言工具，有利于从事与此相关领域的学习、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有利于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中国古代史中的先秦史的研究，是必须利用古文字的。先秦典籍主要用古汉字写成，西汉时的典籍是用隶体写成的，我们现在所见的《诗经》、《尚书》、《史记》、《汉书》等史料远非本来面目。要证明这些史料的可信度、订正史料错误，甚至补充其不足，除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外，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依靠地下不断出土的古文字资料。^③例如，利用甲骨文资料来考订《史记》的真实性，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朝的世系中有“报丁、报乙、报丙”三王，而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人通过缀合甲骨文整理出的商代世系中，“三报”的顺序却是“报乙”、“报丙”、“报丁”。这一订正，不但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同时还考证出了“报”字的原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考订工作，证明了《史记》的可靠程度。^④李济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⑤另外一个例子是：根据《尚书·牧誓》的记载，武王灭商是在“甲子”之日的早晨，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的铭文即证实了这一史实。

我们在古文字中看到的史料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等等，无所不包。例如，根据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了解中国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显的例证。另外，近些年来陆续发现的战国古文字资料，又给古代史研究增加了崭新的内容，并且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

第二，有利于从事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

以古文字证古史，离不开考古学。古文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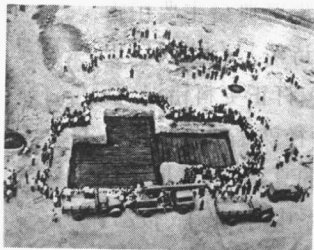
《利簋》及其铭文



浙川下寺楚墓 M2 遗物出土情况



浙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



曾侯乙墓

该墓为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墓中共出土随葬品一万件以上。共有铜器铭文二千八百多字;竹简文字有六百多个。加上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共约一万余字。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或作持)”之类的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既可归入语言文字学的范畴,又可归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与历史考古的关系至为密切。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古文字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是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的直接获得者,在墓葬或遗址中,如伴有古文字资料的发现,即可赖以解决墓葬的年代、主人等关键性问题,从而弄清考古对象的具体细节。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确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出编钟的铭文和竹简文字。张光直先生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⑥

第三,有利于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流传到今天,不少地方已有很大变化。有些字句出现不同的写法和讲法,如何明辨是非、进行取舍,利用古文字来考证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古籍整理所涉及的字形、音韵、训诂与古文字都有直接的关系。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等著作阐述了古籍中文字、声韵、训诂和古代文献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离开了古文字,整理先秦典籍时,遇到的许多问题将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于省吾曾经指出:“我们有时看到敦煌发现的古钞本或宋元刻本,其文字偶有异同,便视同秘籍,诧为瑰宝,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量古文字,如果与地上史料相印证,基本可以恢复先秦典籍的真面目,较之古钞本与宋元刻本的珍贵又当如何?”^⑦

因此,要想提高古代文献的整理水平,注意利用古文字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有时文献典籍的内容涉及到一个朝代不同的统治思想,古文字的解读就会更加复杂,其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整理”的范围。

注释:

- ①《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 ②《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③如公元 279 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官史,记有夏、商、西周、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史事。它可以校正《史记》等史书上的错误,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 ④司马迁利用太史令的便利条件,在其父司马谈编纂文书的基础上,网罗散失旧闻,考核古迹传说,尽可能详尽地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述了商代的历史。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唯一能够凭借的比较完备的文献资料。
- ⑤《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序》,见《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1 页。
-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⑦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二章 汉字的发展沿革

汉字从古至今,经历了起源、发展和成熟等几个时期。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形态的文字相比,汉字的发展体现了一脉相承而无间断的特点。综合其整个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先秦古文字阶段,秦汉隶书文字^①阶段,两晋、隋唐至20世纪中叶应用的真书(正楷汉字)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广应用的简化汉字阶段。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

结绳之政与神话传说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结绳记事这种方法。我国古代文献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庄子》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老子》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着,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根据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发明文字之前,确实有一个用实物帮助记忆的阶段,如利用结绳、在实物上刻划符号、堆石等方法。其中结绳法最为普遍,这可以古代埃及、古波斯,近代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以及解放前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等为例。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先民以绳打结为标记,用来记叙事件、沟通信息等,自有其客观需求,但也有其局限性。鲁迅曾说:“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绳记事,只是个人或群体用来帮助记忆的工具,不能用于交流思想,因此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也不等于文字,



结绳纪事图



积石证事图



刻划记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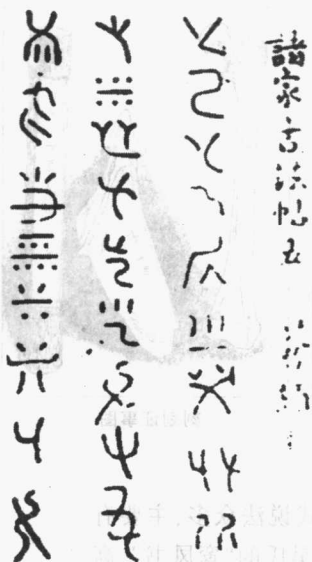
不可能发展到文字阶段。

有关汉字起源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所谓的文字形式说法众多,主要有伏羲画八卦的“龙书”、神农作的“穗书”、黄帝写的“云书”、少昊氏的“鸾凤书”、高阳氏的“蝌蚪文”、高辛氏的“仙人书”、尧的“龟书”、大禹的“钟鼎文”,等等。这些原始氏族首领和部落联盟酋长各代表了史前某一个时期。文字的创造发明,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完成的,但透过神话传说的表层,可以探究到汉字起源的一些基本线索。

仓颉造字的思考 在诸多的汉字起源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最有代表性。这种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③仓颉是否确有其人,历代说法多不一致。他的身份也颇为扑朔迷离。司马迁、班固等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则明显带有神话的味道。如王充《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并不可信。一般认为,犹如“燧人氏”代表钻木取火,“神农氏”代表农业种植那样,仓颉造字应当代表了一个文字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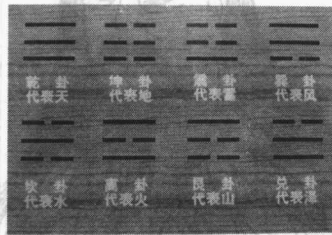
仓颉像



传说中的“仓颉书”



伏羲画卦图



八卦符号及其意义

过程中的历史阶段。鲁迅说过,“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④这深刻说明了众多传说与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汉字产生,绝非由一人于某一时期所独立创造,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某些必须使用文字的社会群体长期摸索、使用,然后约定俗成的结果。仓颉造字说,或者可以看作是对先人创造文字的一种追忆,或者是对文字初创期某人所做的整理、规范工作的代称。

“卦爻制作”与表意符号 比仓颉造字的传说更接近事实的,是卦爻制作和表意符号的出现。先秦文献有“庖牺作八卦”的说法:“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⑤不过这一记录并没有直接说八卦是文字的前身。后来,宋代的郑樵明确提出了“文字起源于八卦”的观点。^⑥

客观地说,八卦是古代从事占卜、巫术活动的巫师根据算筹等制作的代表卦辞的符号,包含了较为丰富的信息,用来象征各种事物。《周易》中的阴阳八卦符号和六十四卦的卦象、爻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联变化的过程。这种形式单纯的表意符号,实实在在留存了先民最初的社会人生观和数学算法,透过其中的记述文字和“卦爻制作”的事实,我们也可以想见先民用一些简洁符号记录语言和思想的痕迹。至于与汉字起源是否有联系,目前尚无肯定的结论。

第二节 汉字的萌芽、起源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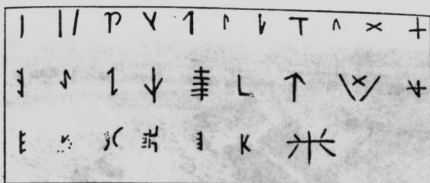
现有考古资料证实,汉字的萌芽发生在公元前 5000 年或更早些时期。在公元前 4000 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

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刻划符号,有的甚至被认定为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 18 个,可以归纳为八种,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将其中的几个刻划符号释读为“旦”、“铎”和“斧”字^⑦。唐兰也释读了“灵”、“炅”和“斤”等字。^⑧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仅“代表个人或氏族形象化的图形标记”,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尚有很大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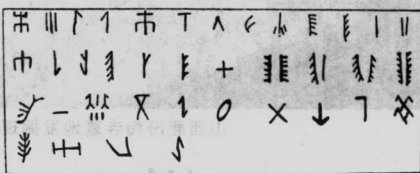
我们将这些陶符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确实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划符号,与青铜器上的族徽更为相似。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看,这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客观而言,它们处于汉字的萌芽阶段,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

新石器时代陶符 汉字由萌芽状态发展到应用于文献记录,经过了一个长远的过程。萌芽时期的汉字以半坡遗址和其他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符为代表。

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其年代约在公元前 4000 年。据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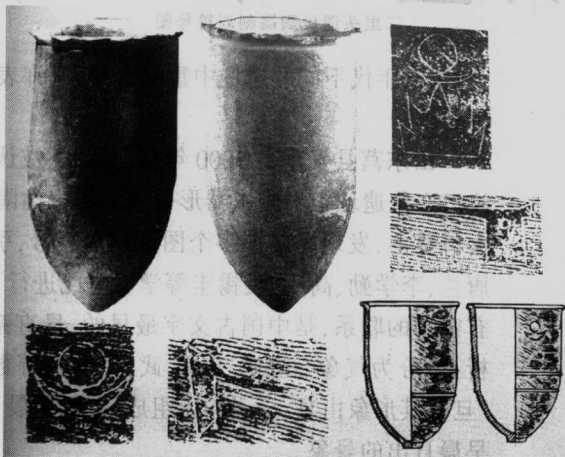
半坡陶符



临潼姜寨陶符



大口尊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陶符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现场


半坡陶器上有各种刻划符号一百九十余个，其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有些符号与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很相似。这些符号均为单独使用，看不出它们与语言有何联系，不过，其中类似数字的符号，很可能是数字的前身。有学者指出，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⑨



二里头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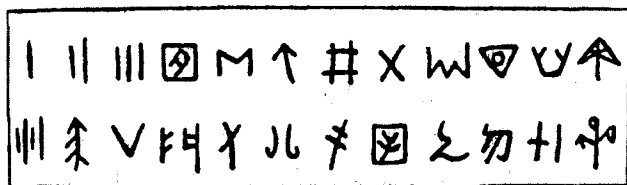
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这种类似半坡数字的符号。1972~1974年陕西姜寨出土的陶器^⑩、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⑪以及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陶器上都有类似符号^⑫。姜寨也属仰韶文化，年代比半坡稍后。柳湾为甘肃马厂类型文化，时间约为公元前2060多年，与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年代相近。这些相同或相似的

符号，在年代不同的遗址中重复出现，或许表明了它们在当时已被较为普遍地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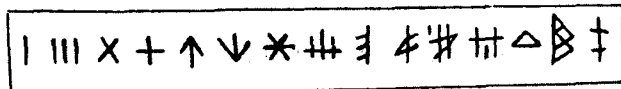
山东莒县发现的5000年前的陶文，被认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雏形。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器形硕大的代表性陶器——灰陶大口尊。在众多的陶制大口尊上，发现了二十多个图形刻划符号，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于省吾、唐兰、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肯定它们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古文字最早的、最直系的源头。从陶文的形体、结构来分析，可分为气象、植物、工具、武器、制陶等数种。其中的陶文“”，于省吾释为“旦”。其形象由日、云、气、山组成，象征早晨云气承托着太阳出现在山上，描绘了早晨日出的景象。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书写的朱书文字是一重大发现。研究表明:其文字与殷墟甲骨文非常相似,反映四千多年前即至迟在夏代前期,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字已经用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区,就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特点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整体看,很可能不是古代文字零星的遗留,而代表了一份完整的“文献”。



二里头夏代遗址陶器划符号



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陶符

文明萌生期陶符 在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骨片上,发现了一二十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经接近甲骨文。这些符号,为研究文字成熟之前的发展阶段提供了若干线索。^⑤

目前对于汉字起源的理解,大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刻划符号,一是象形图绘。这两方面的因素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遗物中早已并存。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后期的陶器上,已经可以发现图画因素转变为象形文字的迹象。原始的刻划符号和象形图绘,经过社会生活和长时间的淘炼,为汉字的诞生起了铺垫作用。至于文字是否还存在其他起因,则有待于新的考古发掘和对现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汉字的逐步成熟时期

汉字的成熟,当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由此而下,依次为金文、战国文字等。

甲骨文 主要是指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现在一般认为,夏商之际开始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字体系,同时也开始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殷墟的商代刻辞甲骨,是1899年秋在河南安阳被发现的。安阳是殷商晚期